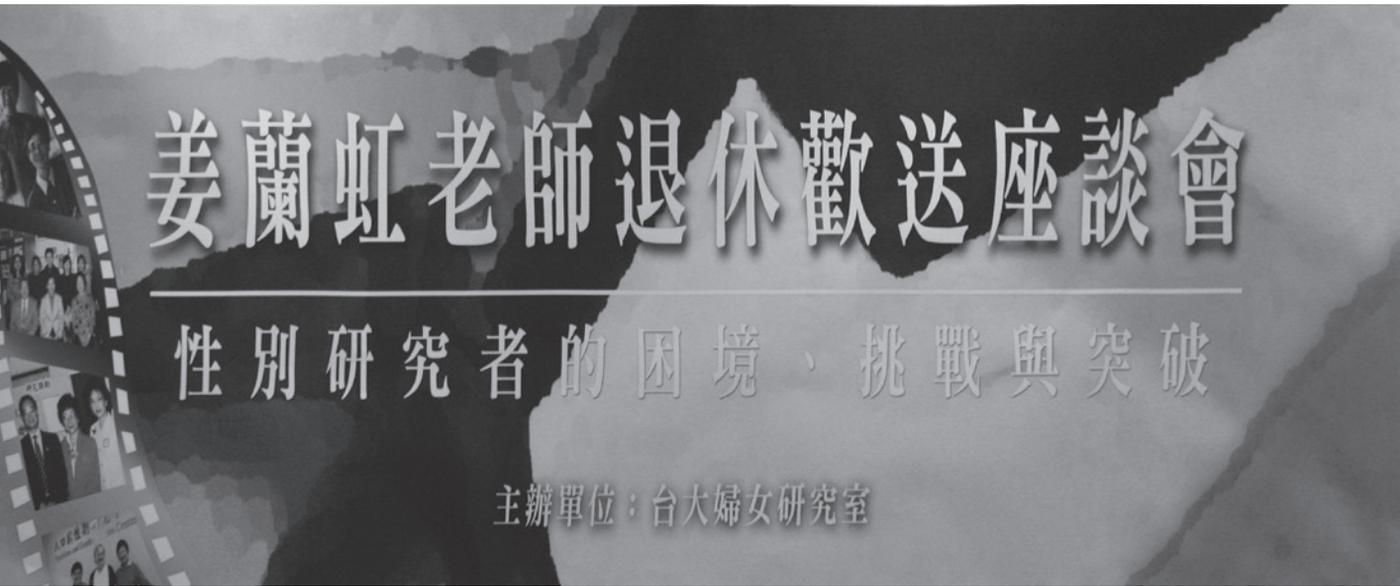




姜蘭虹老師退休歡送座談會—— 性別研究者的困境、挑戰、與突破

整理 | 編輯室



會議時間：2011年4月9日〈六〉14:00—17:00

會議地點：集思臺大會議中心亞歷山大廳（國立臺灣大學第二活動中心內）

主辦單位：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

主持人：黃長玲教授（臺大婦女研究室現任召集人）

引言人：姜蘭虹教授（臺大婦女研究室共同創辦人）：「臺灣與香港女性主義地理學的發展」

與談人：顧燕翎教授（臺大婦女研究室共同創辦人）：「含淚播種，歡笑收割」

張 珏教授（臺大婦女研究室第三任召集人）：「性別研究，健康人生」

林維紅教授（臺大婦女研究室第四任召集人）*：「從歷史研究到女性主義實踐」

* 林維紅教授之發言稿將另文刊登

前言

臺大婦女研究室共同創辦人姜蘭虹教授，在來自四面八方、不同年代婦運參與者的歡送之下，於研究室成立邁入第二十六年之際正式從教職崗位退休。歡送會現場邀請婦女研究室共同創辦人之一，顧燕翎教授，以及其中兩任召集人——張珏教授、林維紅教授，分別擔任座談會與談人，一同來回顧研究室草創時期的甘苦點滴。主持人黃長玲教授開場時表示：「今天的座談會十分難得，因為在這個場合裡，我們婦女研究室的前輩們，從創辦人姜蘭虹老師與顧燕翎老師，還有婦女研究室好幾任召集人——任期最重的公衛學院的張珏老師、活動量最大的林維紅老師，大家都齊聚一堂，分享婦女研究室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開疆闢土的艱辛，以及在性別研究、性別領域教學發展方面所經歷的個人生涯經驗與感想，與我們分享和婦女研究室一同走過的歲月。」

在引言人和各與談人發言之前，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的主任，張錦華教授，先簡單介紹姜蘭虹教授的專長為性

別地理學，近年來以移民研究為主，是少數人口與性別研究兼具的學者；此外，姜教授不但是研究室創辦人及歷任召集人之一，也曾擔任過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的主任。張錦華教授代表中心向姜教授獻上最高的敬意，並現場誦讀一封來自舊金山Shel Severinghaus^①先生的致意信，信裡不但肯定姜教授在學術領域上的成就，更提到她對婦女研究室的貢獻及身為臺灣婦女研究先驅的角色。

以下依照座談會發言的順序，一一節錄四位講者對於參與婦女研究室事務和早期臺灣婦運的發言。



姜蘭虹教授

「經過了廿六年，我們已經很成熟了！」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婦女研究室的熱情歡送，也感謝多年來所有幫忙成立、支持過婦女研究室的同仁，包括歷任婦研室的召集人以及助理、婦運團體、性別研究組織、協會、各個資助過婦女研究的單位、媒體記者，以及年輕的同學們。今天我主要想談兩個方面，一是自己怎麼樣踏入婦女研究的過程，另一個是香港跟臺灣女性主義地理

① Shel Severinghaus是1980年至1987年期間亞洲基金會的負責人，而臺大婦女研究室就是在該基金會的資助之下，得以於1985年順利成立。



座談會現場幾位教授的合影：由左而右分別為臺大婦女研究室現任召集人黃長玲教授，研究室成員葉德蘭教授，臺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主任張錦華教授，姜蘭虹教授，以及研究室成員陳昭如教授。

學。

說起來我的女性意識可能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啟蒙；在我這個年齡的女性，大多是成長於父親威權、母親喋聲的傳統家庭。我雖然處在那樣的環境，但幸運的是可以一直讀書，所以跟當時其它臺灣的婦女比起來，機會比較多一點。我的母親對我影響很大，小時候她對我們三姊妹說：「要多念書，因為自己所擁有的知識是不會被別人拿走的。最重要的就是在經濟上要獨立，不要靠丈夫來養自己。」因此我從小學一路唸到博士，之後從事研究，也都獲得我父母親的鼓勵與支持。

我是一位移民，甚至是早期所謂的「外籍新娘」，因為嫁到臺灣才第一次踏在這片土地上；來臺灣的頭三年是我人生經歷最大文化衝擊的時候，而那時我把不快樂的心境轉化為對學術的投入，一天到晚待在研究室不想回家。我

在臺大地理系除了教學之外，還要從事博士論文、養兒育女、為人媳婦，實在心力交瘁。每當談到家裡和公領域之間角色的調整，就感到真的好辛苦。或許這也是我做婦女研究的動力，我很想知道為何自己常覺得日常生活的壓迫感這麼重。

我的博士論文關注於臺灣城鄉移動的婦女身上。我發現臺灣人口遷移的研究，都只講男性，實際上在70年代，臺灣農村婦女大量湧入工廠，且絕大部分皆從事進口替代工業。當時我向夏威夷大學提出論文的計畫被委員會阻撓，理由是：怎麼可以只研究婦女？應當也要研究男性以相互比較。為了應付委員會，我只好做比較研究。於是我住在苗栗、雲林一帶將近兩個月，以抽樣的方式帶着助理及學生，訪問了八百多戶農家；第二階段到臺北縣市親自深入訪問大約八十多位。這段經歷到了今天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大，即使是現在，我還是很懷念那段時間的研究經驗。

關於婦女研究室的開創，在此簡單扼要地說明一下。有一次，亞洲協會的代表Shel Severinghaus到人口研究中心參觀時說：「你們人口中心都沒什麼活動的樣子，妳就在這邊辦一個國際會議嘛！」我就辦了會議；六個月後，他又建議我成立婦女研究室，雖然那時不知道會怎麼樣發展下去，但我仍說：「好吧！」於是找了其他三個人，也就是共

同創辦人周碧娥、顧燕翎和崔伊蘭。我們四位一開始就很投入，很多想法都是大家每星期開會時腦力激盪進而形成構思，然後一起實踐。想不到會一直持續下去，由不同的召集人接手到現在已經二十六年了！都是靠各位接棒人的努力才能有今日豐碩的成果。

第二部分，我就簡單回顧這些年的經驗，希望不會太無趣，也稍微輕鬆一點，畢竟苦日子已經不會再回來了。在臺灣，女性主義地理學一直都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我想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提到「地理」，大家想到的都是地震、山崩，土石流，大多為自然科學研究，而這些研究者對人文地理中的性別議題完全沒有興趣；第二，地理學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創辦於1904年的美國地理學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一百多年來歷任的女性會長總共才10人！至於臺灣的現況，我曾在兩三年前統計地理系相關師資的性別比例，當時全臺灣的地理學者為112位，其中33位是女性，差不多佔總數的28%。

回到婦女研究的主題，我認為在臺灣算是做得可圈可點。回想起來，當時到研究室來找資料、參與研討會及課程的人來自四面八方，且兩性關係的課程在一般大專院校是風起雲湧地開設；因此，在香港學者面前，我是相當驕傲的。在臺灣，跟性別有關的研究室有12

個之多。在臺大，除了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的婦女研究室之外，城鄉所也有一個性別與空間研究室；另外，有清大的性別與社會研究室，高雄醫學大學的兩性與性別研究中心，淡江大學的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中央大學的性／別研究室，世新大學的性別與傳播研究室，東海大學的性別與文化研究室、高師大的性別與教育研究室，以及成大的婦女研究中心。

至於香港的狀況則與臺灣有點不同：一是臺灣的學校多，設立性別研究相關課程的學校有13個；香港有8所大學，每一個學校都有開相關課程。二是在臺灣只有臺灣大學有婦女研究學程，而香港中文大學是從1998年開始正式頒授婦女研究學位。另外，香港中文大學的性別研究中心（The Gender Research Centre）跟我們的成立年代完全一樣！不約而同都在1985年。不過他們的經費可能比我們豐富得多，大部分在那邊唸書的學生都有獎學金、課堂裡也都有正式的助教，制度上的支持比較強。

最後我想談談未來的展望。一開始在地理學界，我認為不管是男性、女性，大多都是性別盲（gender-blind）；他們不覺得人文地理學的領域內，有一部分的研究在海外發展得如此出色，而臺灣卻獨獨缺席。事實上，國際地理學會的性別與地理委員會陣容堅強，而我們經常舉辦國際交流的相關活動，在這



樣的脈絡之下，還有機會改善性別盲的現象。目前女性主義地理學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空間，特別是亞洲女性主義地理學者，正逐漸嶄露頭角：韓國有一兩位，中國大陸據說是兩三位，而日本有好幾位男性，新加坡也有好幾位傑出的學者。在與國際地理學會委員會連結之外，和亞洲女性的連結也是非常好的，大家能在各自的學院裡建立女性主義的一席之地。

關於和國外的連結，我想每一位都有任務；最近在2007年，在臺灣也舉辦了性別與地理委員會會議（Symposium of the IGU Commission on Gender and Geography），從這裡可以看到我們的潛力是很大的。身為第一代的女性主義學者，我覺得我們還有很多可以發揮的地方，無論是在國際期刊，或是國際網絡連結方面。各位可以瀏覽婦女研究室的網站，以前主要是我們四個人，現在的主要成員是當時的一倍：張珏、林維紅、余漢儀、黃長玲、葉德蘭、陳妙芬、黃宗儀、洪貞玲，還有新加入的陳

昭如。我想在張錦華主任還有黃長玲召集人很有遠見的領導方式之下，相信將來婦女研究室的發展一定會非常好。最後，以一個學科而言，我們可以說：「經過了廿六年，我們已經很成熟了！」謝謝各位！

顧燕翎

「我一直在找尋自己最愛做什麼事情，後來發現：就是女性主義」

聽姜老師帶我們從80年代開始回顧家庭、工作經驗，尤其她說在私領域中頗受挫折，剛到臺灣時很不適應，但在研究工作上如魚得水、非常快樂；我發現自己的經驗剛好相反，我從小長大並沒有感受到非常強烈的性別不平等。去美國唸書時，適逢第二波婦運的高峰期，學校有一些年輕的女生，別人會說她們是“women's libbers”，認為這些「頭髮很短、說話時很多張牙舞爪的姿勢和表情的」，是一群「另類」。當時我自己也沒有非常認同女性主義，後來讀到Margery Wolf在臺灣做的鄉村婦女研究，她特別提出「子宮家庭」的概念、也曾研究過中國歷史上婦女自殺的問題，我才發現：即使我個人沒有親身感受、經歷、或是不曾聽聞過，未必表示這樣的



臺大婦女研究室的歷史照片

事情不存在或是沒有發生。

非常幸運的是，在我開始發展學術興趣的時候，剛好遇到婦運的衝擊以及後來的婦女研究。我一直在找尋自己最愛做什麼事情，後來發現：就是女性主義。我回國之後剛好是1975年，當時一方面是臺灣的轉型時期，一方面是像我們一樣戰後出生的年輕人特別多；大多數我們這一代的人都很幸運，沒有經過戰亂、又有順利的求學過程，所以充滿了自信，好像什麼都不怕。我們父母親和之前的那一代就有很多恐懼，特別是對政治的恐懼，可是我們比較沒有經歷過直接的挫折，所以很多事情都想去做、去改變，而這個時候碰到世界第二波婦運，我個人覺得非常幸運。

我自己是先受到刺激之後，開始對女性的處境感興趣，才參加婦女運動；當時臺灣的社會脈絡也是促成我參與動機的原因。那時有兩個事件，一是「大學女生太多」，立法院主張要限制女生的錄取名額；二是「鍾肇滿殺妻案」，留學生鍾肇滿在殺了太太之後返台，結果獲得當時社會極大的同情，認妻子沒有能力協助丈夫完成學位是很大的罪過。在這些衝擊之下，我開始投入婦女運動、自然而然渴望做婦女研究，但在現有的學術領域中都沒辦法得到滿足，所以從中國的歷史去找、從西方的理論去找，最後發現應該做本土的研究，於是就這樣開始參與臺灣婦女運動。



張錦華教授（中）及黃長玲教授（左）謹代表臺大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臺大婦女研究室，向姜蘭虹教授致意並感謝她多年來為性別研究的貢獻。照片中由左而右分別為黃長玲教授、張錦華教授及姜蘭虹教授。

臺灣今天婦運的成果，跟全世界的婦女運動很有關係。大概從1976年到1985年是聯合國的「婦女十年」，這段期間有很多的發展，如1979年聯合國通過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就是我們現在臺灣大力推行的CEDAW（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幾乎全世界大部分的婦女研究機構，還有亞洲的婦女運動團體，都在這十年之間成立。臺灣從1985年之後，歷經許多改變，一方面是1987年的解嚴，另一方面就是全世界婦運的浪潮沖開了臺灣的大門。在這十年間，臺灣的婦運和婦研做了很多的活動，同時也面臨很大的衝擊：如何在完全由父權主導的文化社會當中，去發展另一個獨特的聲音？在此發問下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婦運和婦研的關係；另一個是和主流的政治、文化、學術等的關係。此外，我們到底是要「女性」、「婦女」還是「性



別」？這其實都經過種種複雜難解的糾葛和討論。

1990年代，臺大婦女研究室對於「到底要不要採取女性主義觀點」有許多爭議，最後變成由婦女新知基金會設立一個「女性學研究中心」，當然這個名稱也是歷經種種討論。一開始董監事會議的決定是「婦女新知性別研究中心」，因為用「性別」二字較無色彩之分，看起來較為中立，而且它的包容度比較廣、社會接受度也比較高；可是在第一次開會時，就受到很大的挑戰。來自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周顏玲教授大聲質疑，認為我們放棄「女性主體」，於是又回到董監事會激辯：到底要「性別」、「女性」還是「婦女」？僵持難解之際，王瑞香引用了陳幼石教授的一句話：「做狗的時候不要說人話。」換句話說，當女人還沒有得到自主，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研究的時候，妳為什麼就要說自己是「人」？也就是說，女人為什麼要放棄做為女人，而要躲在「性別」的大傘之下？

回顧婦女研究室的歷史，我還記得1985年，我和姜蘭虹去參加亞洲婦女會議回來之後，亞洲基金會的代表 Shel Severinghaus 問我：「妳覺得臺灣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東西？」其實不管是「婦運」或「婦研」都有著共同的願望，那就是成立資料研究中心；這樣一來有任何主張的時候，我們都能有相關

的研究基礎。那時得到該基金會的贊助，再借臺大人口中心的一間辦公室，才成立了婦女研究室。我們希望是由來自不同單位的人，如臺大、中研院、或像我在交大，來組成這個全國性的組織，但是當婦女研究碰到主流的時候該怎麼辦？而為什麼選擇要在臺大？雖然我們覺得若不借用臺大的學術聲望，做婦女研究會遇到很大的社會阻力，但也因為借用其聲望，就會遇到要如何合作、協調等等問題。所以，若你看婦女研究中心的創刊號，就會發現本來說是要「暫借」，現在變成「目前」，後來名稱也改成臺大婦女研究室了。不過我很高興還能夠保留「婦女」這個名稱，對我們這種老革命份子來說，很捨不得太早就丟掉「婦女」或是「女性」這樣的稱呼，還好臺大還保有這個「女性主體」。

在此脈絡之下，《婦女新知雜誌》在1991年8月的時候出了一個專題：到底是婦女研究還是研究婦女？當時在婦女研究室，為了要保持學術研究的客觀中立和科學性，認為「強調女性主義觀點」太運動取向、不夠學術，所以受到排擠打壓。於是黃淑玲、李元貞和我各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婦女新知雜誌》上，表達運動和研究合而為一的想法，當時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的所長徐正光教授也寫了篇〈從批判到反省——也談婦運與婦研的關係〉^②。他的主要觀

點有二，第一：婦運和婦研的最終關懷應該是一致的；第二：臺灣婦研還沒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領域。我覺得很有意思，到底我們臺灣的婦女研究走到今天有沒有自成一格，形成自己特有的研究領域？這是一個滿值得探討的問題。有趣的是，他說這些婦運人士太焦慮了，所以才會這樣發脾氣；其實她們並無惡意，只是很想做事但苦無經費，所以雙方最終應該要攜手合作。他是這麼寫的：「她們心中最感焦慮的與遺憾的恐怕還是未能提供美味可口的羊肉，只好暫時賣賣也許味道不美但絕不會有害於人的狗肉。」但徐教授也道出他的期許：「在柳暗花明疑無路的此刻，何妨讓心情靜下來沉思如何才能打開一條新路，以便有峰迴路轉的一日。」

那麼現在是不是已經「峰迴路轉」了呢？那會是什麼樣的一條路？今天來的時候我問姜蘭虹：「妳覺得婦女研究已經走到盡頭了嗎？」因為我從1991年被問到現在已經二十年了。究竟要如何回答，我覺得很有意思，也是我們未來可以自我期許的地方。

張珏

「婦女被歧視是國家心理不健康，人人有責改善此現象」

在婦女研究和人口議題的推動上，姜蘭虹老師是連結國際及地方的關鍵，讓我們受益匪淺；我個人十分感謝她當初邀我進入婦女研究室。1985年時我剛從國外讀書回來，姜老師問我要不要來幫忙，我說：「我完全搞不懂，但若能夠推動婦女研究促進女性心理健康、男女性都健康的話，我願意試試看。」所以我是在完全懵懂的狀態下進入婦女研究室的。當年蒐集目錄的時候只要談到「女性」，如婦幼衛生、家庭計畫等，通通都放進裡頭；但是現在我們知道，婦產科醫師不見得有性別概念。而也是在這樣學習過程中，慢慢去接受我們是不懂的，再慢慢修正。

在進入婦女研究一同並肩作戰、學習新的經驗之際，我們也會遭遇挫折並學習怎麼面對。我在美國寫論文時，顧燕翎老師正在臺灣推動人工流產合法化，我還對我先生說：「你回去要幫我們女生多講點話」，因為我從來不覺得我們要自己出去講話。可是回臺灣一有婦女研究室，我的第一篇研究就做人工流產合法化以後，墮胎的趨勢增加與否。我開始思考，自己的研究方向如何不會忽略婦女議題？並逐漸在婦女研究室找到我的最愛。姜蘭虹老師真的是我的良師益友，擴展了我的視野，使我認知到不是只有心理系、公共衛生，也有來自地理學、歷史學、法律學等各個領

● 徐正光（1991）。〈從批判到反省——也談婦運與婦研的關係〉，民眾日報，9月2日。



域的戰友。我也看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不只是象牙塔中的理論而已，而是真真切切地在做田野。所以我會問一些自稱為女性主義者的學者，尤其對做子宮頸、女性生產手術經驗相關研究的男性：「你到底有沒有跟女性朋友互動過？」。這些都是要被挑戰、檢視的。

這幾年我希望能把婦女研究的精神帶回到心理健康的領域，也是今天我所要談的婦女健康人生。我們可以看到今日聯合國的發展，在性別主流化的要求之下，各國政策、發展、研究、立法都要有性別觀點跟性別平等概念，所以WHO所有計畫都要檢視性別議題，並將性別平等與婦女充權列為重點目標，促進各國認識、關注文化及生理對婦女健康的影響。反觀臺灣，2000年草草成軍的婦女健康政策，要一直到2005年「臺灣女人連線」成立臺灣女性健康網站，歷經三年在全臺灣辦了十多場公聽會，選出優先次序，最後在2008年才由我和其他婦女研究學者跟著衛生署官員一起寫出現在的婦女健康白皮書。

從積極面來看，性別主流化的健康政策建構了一個健康的生活環境，以維護心理健康、健康體能、飲食健康、性健康、經濟健康、生育健康及權益；此外，照顧者的身心健康、職場的身心健康、慢性病、癌症、還有家庭暴力等等對健康的影響也包括在內。不過，政策常常只是一個宣示，還要看之後的執

行，而目前我們覺得還不夠，所以希望能夠對衛生署已經做過的議題進行性別影響評估。我們成立健康聯盟、要求心理健康，是指婦女研究、性別主流化心理健康也該同步進行，因為離開了心理健康，就不叫作健康。但大部分的人聽到心理健康都只想到心理疾病，其實這是兩個層次。我們每個人都應該開心，假如不開心，心理就不夠健康。根據哈佛大學95年的國家心理健康報告指出，一個國家若充斥著藥物濫用、暴力氾濫的問題，並有許多受虐婦女與兒童存在，在這種社會病態之下，這個國家就是心理不健康的國家。其他惡質的社會情境，如低就業率、低教育、貧窮、工作壓力或性別歧視等，皆為其所涵蓋指涉的條件。所以我們可以說，婦女被歧視是國家心理不健康，人人有責來改善此現象。此外，從性別歧視出發還可延伸至年齡歧視、疾病歧視、族群歧視、階級歧視等等，這些都是婦女研究所關心的議題。

而婦女研究在校園的困境與反控就是內部學派的角力、政治理念掛帥、及科學與人文的衝突。舉例來說，國科會生物組進行性別與科技主流的討論時，在健康方面我們只會看到「婦女的疾病」，停留在將婦女疾病等同於子宮內膜囊腫之類的研究層面，而缺乏社會性別建構影響男女健康的認知與觀點。所以我覺得，現在談的「性別主流化」，



座談會當天參與師生合影。

其實要改成「社會性別」、或者是「社會建構性別主流化」好像會更清楚。另外一個困境是在資源很少的情況下相互競爭，舉例來說，目前臺灣的性工作合法化議題使婦女團體兩派對立，男性在旁邊涼快；同樣地，我也看到女性學者如何結黨營私，與主流男性無異。目前我仍在挑戰，不管你的性別傾向是什麼，即使屬於性別少數，你的族群有沒有做到性別平等？上學期我們兩性關係的課程也改成性別關係，有滿多不同性別傾向的學生參與，我對他們說：「你可以參加同志遊行，可是你要觀察誰在性別歧視。」那才是最基本的認知，而不是：「我是少數就能大聲講話、我什麼都要。」所以即便處境艱難、人力資源不足，婦女研究還是要繼續在校園內紮根，學程、研究所還要不斷建立。

另外，人和與堅持也是不可或缺的

元素。我們研究室所辦的學術期刊《女學學誌》，就是在研究室沒有人力與經費的情況下，從姜蘭虹老師說要有專屬期刊的建議、到林維紅老師這幾年下的功夫，用心經營至今。正如今天座談會的標題——「性別研究者的困境、挑戰與突破」，就是要有心人士正直勇敢開發資源的動力，加上宏觀的國際視野以及姊妹情誼，才能迎接挑戰、突破困境。最後，我們也必須不斷修正性別主流化之策略、增加性別敏感的訓練並爭取正式的機制和資源，以促進未來性別平等之目標。

結語

在各個講者分享一路走來歷經各種困境、挑戰，更有無數突破的奮鬥過程之後，現場不少婦女與性別研究的學者



接續回應^①，除了簡述自身與婦女研究室的淵源以外，也感念前輩們對此一領域的努力開拓，其無私的貢獻為當初欲從事相關研究的莘莘學子紮下根基，孕育出今日開枝散葉的成果。來自政治大學的陳惠馨教授，在簡短的回應中即提到：「如果沒有臺大婦女研究室，我不會作婦女研究。」清華大學的謝小岑教授開玩笑地說，姜教授退休，自己也跟著變資深了，同時表達老中青三代共聚一堂的興奮心情；臺灣大學的王麗容教授則感嘆，有鑒於性別研究學者的種種付出，學校是否能提供更友善、無歧視的環境；同樣在臺灣大學任教的陳昭如教授表示，在聽完前輩們的發言之後頗有感觸，覺得自己現在回國教書感受到不太一樣的困境；而過去習慣於臺北、臺大學術資源的王舒芸教授，如今來到

中正大學才發現，要成立研究室或開設性別研究相關課程是多麼困難與辛苦；同樣具備女性主義地理學專長的孫瑞穗老師，特別感謝姜教授扮演的重要傳承角色，讓後人能在穩固的基礎上有所發揮、繼續深究。

在場還有臺灣大學社工系余漢儀教授、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副所長曾瑞鈴研究員等，雖未正式發言回應與談人，但皆對姜蘭虹老師在婦女與性別研究領域的付出表達深摯的敬意。

座談會進行到尾聲，主持人黃長玲教授以簡單有力的結語回應在場發言者，並為當日座談會劃下完滿的句點。她提到，歷史上所謂進步議題、進步價值，常常都是少數在倡議，但我們要有信心，因為觀察人類歷史的變化，所有後來成為普世價值的東西，一開始都只是少數人的意見。身為女性主義者，我們要相信性別平權價值的生命能量，並以此與大家彼此勉勵，做為座談會的總結。



臺大婦女研究室的歷史照片，紀錄二十六年以來大家在性別研究領域共同走過的甘苦點滴。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最新專題徵稿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為半年刊，每年6月、12月出刊，不限於專題，隨時接受各類性別研究投稿。最新專題徵稿有：性別與宗教、性別與交通／運輸。

【性別與宗教】專題

性別平等與宗教自由為當代多元文化主義的核心議題，但是兩者的關係錯綜複雜。無論是教義、儀典、組織運作或與信眾互動的方式，宗教組織或宗教團體對於性別角色、性別分工、與性別平權議題的態度都很值得關注。本期專題希望從性別平等的角度檢視當代宗教的發展，無論是從理論上的探討教義、分析儀典，或是從實證上研究宗教組織之運作，信眾的態度與價值，都希望能形成性別研究與宗教研究的積極對話。

截稿日期：2012年2月1日

【性別與交通／運輸】專題

交通運輸與性別之間的關係，是性別研究領域中較為陌生的議題。然而，女性比男性更依賴大眾運輸系統，是交通運輸學者及性別研究學者都很熟悉的現象。從運輸工具的設計、運輸路線的規劃、乃至不同的運輸方式所具備的性別意涵，都是有待研究的議題。本期專題希望探討性別與交通／運輸的關係，無論是使用經驗的研究或是設計規劃理念的檢討，都希望能經由此一專題，拓展台灣性別研究的視野，呈現更多跨領域研究的成果。

截稿日期：2012年9月1日

來信請寄至《女學學誌》編輯委員會信箱：ntugenderstudies@gmail.com

或郵寄至「106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臺大婦女研究室」。

詳細撰稿體例請上臺大婦女研究室網站查詢，或來電詢問：(02)2363-0197